

## 在歷史終結之處

● 丁松泉



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著，黃勝強等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在我們面前呈現的，有三種不同的歷史：其一是自然或人類社會的客觀進程，即通常意義上的歷史；其二是司馬遷和希羅多德 (Herodotus)、修西底德 (Thucydides) 的歷史，那是對前者的記載和闡釋，它不只是純客觀性的東西，而是主客體的交融。還有另一種歷史——康德 (Immanuel Kant)、黑格爾 (G. W. F. Hegel) 所稱的普遍的歷史，是「自由意識的進步」，是人人企求自由的過程 (康

德)。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所「終結」的，就是這種意義上的歷史。

福山對歷史「終結」，主要始於對黑格爾的詮釋。黑格爾認為真正能使人感到滿足的並不是豐富的物質，而是對其地位和尊嚴的認可。經由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那驅動歷史車輪的欲望——為獲得認可而進行鬥爭——現在已經在一個實現了普遍和互相認可的社會中得到了滿足，以「為獲得認可而鬥爭」開端的歷史，就因為這種認可的實現和滿足而走到了盡頭。

黑格爾認為，人類自由的載體是現代立憲制國家，也即自由民主國家，人類的世界普遍史只不過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即人逐漸走向完全理性，並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國家中知道如何表達理性本身。福山告訴我們，黑格爾是主張自由的哲學家，他認為歷史的全部過程會於所有政治和社會制度都實現之日走到終點。黑格爾的偉大詮釋者柯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認為，自由民主制度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認可的問題，堅定地斷言歷史已經終結。就連右翼哲學家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也相信，自由民主國家最典型的公民是「最後之人」。借助於黑格爾和柯耶夫，福山斷言，自由民主制度以獲得平等認可的理性欲望取代了獲得比別人更偉大的認可的非理性欲望。他指出，「如果

福山談的歷史「終結」，主要始於對黑格爾的詮釋。黑格爾認為真正使人感到滿足的是對其地位和尊嚴的認可。經由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以「為獲得認可而鬥爭」開端的歷史，就因為這種認可的實現和滿足而走到了盡頭。

沒有經歷過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及其在不同形態各相關國家的生活，沒有親眼看見或體驗右翼獨裁倒台和柏林牆倒塌，就沒有「終結論」顯示生命力的空間。自由主義的一個悖論是，它的價值和生命力只有在人類經歷了專制主義對人類尊嚴與價值的毀滅性打擊後才得以體現。

人類社會經過數世紀發展都朝着自由民主這個唯一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演變或聚集，如果自由民主是唯一的最佳選擇，並且如果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對他們的生活沒表示根本的不滿，我們就可以說這場對話得出了一個最後的決定性結論，歷史主義哲學家會不得不接受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和終結性。」(頁154)

在此書中文版出版前，中國大陸學者從英文版引入了福山的論斷，更確切地說開展了對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批判。那種批判不值得在此探討，而從那些批判性的文章中，我以為只是福山「終結」了歷史。當我真正閱讀福山後，才發覺黑格爾、柯耶夫早就終結了歷史，福山只是對他們作了更廣泛的詮釋。但何以只是福山的「終結」引起了如此關注和爭論呢？我以為，這是因為經由二十世紀右翼獨裁和左右翼專制主義的盛衰歷程，人們不再以狐疑的目光看待「終結」，而是從現實中感覺到這種「終結」的實在性和必然性，從而使「終結」說能引起更廣泛的共鳴以至更深刻的震撼。沒有經歷過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及其在各相關國家的不同形態的呈現，沒有親身看見或體驗右翼獨裁的倒台和柏林牆的倒塌，就沒有「終結論」顯示生命力的空間。自由主義的一個悖論是，它的價值和生命力只有在人類經歷了專制主義對人類尊嚴與價值的毀滅性打擊後才能體現出來。福山的學術幸運也就在此。

二十世紀的政治危機導致幾千萬人被屠殺，幾億人被迫生活在更野蠻的奴隸制度下；而思想危機則使自由民主制度一度喪失了捍衛自己的理論基礎。福山認為，二十世紀的戰爭與革命更意識形態化，因

此比過去更為極端。蘇聯和中國的革命與納粹在二戰期間的征服，以一種誇張的形式再現了十六世紀宗教戰爭所具有的野蠻，那種戰爭所危及的不僅是土地和資源，還包括全體人民的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二十世紀是顯示獨裁主義和專制主義危機並最終走向崩潰的世紀，福山用兩個章節來闡述強權國家的致命弱點，這是本書最引人入勝和具啟發性的地方。福山指出，自由民主國家因為需要保障一定範圍的個人權利，而明顯地削弱了國家的權力，因而被視作弱國。相反，「專制制度不論是右翼還是左翼都曾尋求使用國家權力去剝奪公民的私人領域，並對其進行控制，以達到不同的目的：或是擴充軍事力量，或是推行平均主義的社會秩序，或是實現快速經濟增長。個人自由支配的領域所失去的權利，只能在國家利益的層面上得到彌補」(頁17)。福山指出，其實我們錯誤地估計了專制制度自我永存的能力，這些強國最有可能被摧毀的致命弱點，是其政治制度不具有合法性，即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危機。

福山指出，二十世紀最大的陰謀，是企圖建立一個連續的、右翼的、非民主的並且不平等的合法性原則，這就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始終認為合法性的終極源泉是種族或民族，而由於納粹所信奉的日耳曼種族的優越性必須通過與其他文化衝突才能得到肯定，因此，戰爭是必然的。希特勒把他對合法性的尋求建立在統治世界的許諾之上，但法西斯主義一直受着內在矛盾的困擾。當它需要用戰爭來顯示其合法性力量時，軍國主義本性的暴露、戰爭的殘酷性與失敗又使納粹失去了感召力。如果希特勒獲得

了勝利，全世界處於日耳曼民族帝國統治之下，法西斯不再需要通過戰爭和征服來證實其民族的優越性時，它自身又便失去了存在的內在理由。福山認為，由於法西斯主義過份強調軍國主義和戰爭，必然會與國際體系發生自我毀滅式的衝突，結果自從二戰結束以來，法西斯主義就一直構不成自由民主制度的真正的意識形態對手。

納粹崩潰後，右翼中取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是一些持久穩固但實質上未成系統的軍人獨裁集團。它們僅限於維持一定的社會秩序，它們沒有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那樣的一套國家學說與合法性理論來從理論上支持其永久的獨裁統治。他們中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民主和民權的原理，並且以各種藉口認為他們的國家尚不具備民主的條件。由於缺乏合法性的內在源泉，一旦這些政權實現自己的有限目標如恢復秩序、結束經濟動盪等，右翼獨裁者就會發現他們不再有理由繼續掌管政權，並且喪失自信。拉美和歐洲的右翼獨裁者感到必須通過同意選舉來給自己罩上至少是一種民主的光環。或者他們不得不借助於操縱選舉，如北洋時期曹錕賄選。這些獨裁者或借助於一時掌握的武力，或得益於一時的社會動盪與危機維持統治，但往往曇花一現，甚至等不到人亡即「政」息了。因此，右翼獨裁的終結和走向自由民主相對比較容易。

福山認為，以蘇聯和納粹德國為標誌的專制主義不同於十九世紀傳統的獨裁主義，那種獨裁從不企圖改造「文明社會」——社會私人利益領域，而只是企圖控制這樣的社會。相反，專制主義試圖完全摧毀文明社會，尋求對其公民生活實行

完全的控制。從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開始，蘇維埃國家就系統地攻擊了俄羅斯社會所有潛在的與專制主義相競爭的組織。專制主義國家還希望通過控制新聞媒體、教育和政治宣傳來改變人的信仰和價值結構，來重塑蘇維埃人自己，這種控制擴展到人類最隱私的、最親密的關係，包括家庭關係。它不僅剝奪新蘇維埃人的自由，而且使他們害怕自由，甘願受到保護，並在即使沒有別人強迫時，也認為戴在他身上的枷鎖是對他的愛護，以此建立其合法性。但是，這種不可一世的專制主義也存在致命的弱點，它不僅體現為經濟危機，更體現為整個制度的合法性危機。福山指出，經濟上的失敗只是蘇聯體制一系列失敗中的一環，那些失敗導致了信仰體系的加速崩潰，並使社會基礎結構的脆弱點暴露無遺。它最根本的失敗是在控制思想方面的失敗，對它感到憤怒的不僅是制度的受害者，而且也是它的受益者，如葉利欽(Boris Yeltsin)和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等。藉着恐怖進行長期有效統治是不可能的，在那種狀態下，即使是斯大林接班人赫魯曉夫(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也體會到斯大林眼睛奇怪的一瞥會為一個政治局委員帶來大難臨頭的恐懼，這使得這個體系中的高層和其他受益者也无法忍受那樣的生活。一旦恐怖有所鬆懈，信仰體系就會失控。福山指出，1989年後，共產主義的概念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它過去曾自封是一種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級、更先進的文明形態，此後卻與相對的政治和經濟落後聯繫在一起。它已經不再產生一種充滿活力並且具有號召力的思想。那些稱為共產主義者的人們

以蘇聯和納粹德國為標誌的專制主義試圖完全摧毀文明社會，尋求對其公民生活實行完全的控制。但是，這種不可一世的專制主義也存在致命的弱點：它不僅體現為經濟危機，更體現為整個制度的合法性危機。1989年後，共產主義與相對的政治和經濟落後聯繫在一起，它已經不再產生一種充滿活力並且具有號召力的思想。

以往的歷史是處在民主自由與外在專制的鬥爭之中，「後歷史」的人類將在民主自由制度的框架內，面對自身的矛盾而需要進行鬥爭。人不是上帝，可以超越有限與自由的矛盾與辯證運動。那麼，後歷史的人類是否將為着某種超越而鬥爭呢？

正處在尷尬的境地，他們發現自己正在捍衛着過時的社會秩序。這樣，共產主義對自由民主制度形成的意識形態威脅現在已經結束了。尚沒有一種更好的制度可以超越自由民主制度下人們對它的認可。

福山用了較多篇幅闡釋歷史終結後的「最後的人」及其生存狀況，不過在筆者看來這顯得繁瑣和乏力。福山注意到了「最後的人」所面臨的自由與平等的問題，以及生活在沒有鬥爭的世俗中的某些無聊，一如1968年法國學生的舉動，對於仍在為獲得認可而鬥爭的尚在歷史中的國家的人們來說，頗覺不可思議。人類還面臨着文化豐富性與多樣性的喪失的問題。福山沒能提示後歷史社會的實質性問題。

因此，在被福山終結的地方，我們開始追問後歷史的社會中人類的困惑與希望。如果我們認可福山對歷史的終結，那也是意味着人類獲得認可的鬥爭的完成。人類還面臨着新的問題，也許得開啟一種新的歷史。蒂里希 (Paul Tillich) 認為，「人是有限的自由」，人的存在就是有限與自由的辯證運動。既然如此，在歷史被「終結」的地方，人類要開始一輪新的進程，以往的歷史是處在民主自由與外在專制的鬥爭之中，「後歷史」的人類將在民主自由制度的框架內，面對自身的矛盾而需要進行鬥爭。人不是上帝，可以超越有限與自由的矛盾與辯證運動。那麼，後歷史的人類是否將為着某種超越而鬥爭呢？

## 作為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 新古典經濟學

- 盧周來



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著，周立群、韓亮、余文波譯：  
《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經濟體制轉型的理論與證據》(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的《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經濟體制轉型的理論與證據》，是作者在1990年4月於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維克塞爾論壇所作的系列講座基礎之上，擴充而成的一部專著。